



赵启正先生的《公共外交与跨文化交流》在中国出版后,日本迅速地出版了日文版。因为此书较全面地阐述了公共外交在中国的界定和讲解了中国各部门公共外交事业的分工合作的阵容。我作为此书的编译责任人遂将日文版的书名调整为《中国的公共外交》,这对日本读者是最为合适的了。

但长期以来,无论在中国还是日本对于大多数公众百姓而言,“公共外交”这个词却不乏陌生,能说出其中内涵者更是凤毛麟角。然而,生活在当代社会的人们则有必要对其抱有自觉的理解。因为,我们中的很多人其实正在无意识地参与和加入到“公共外交”之中。

赵启正先生所著《公共外交》一书的最大贡献就在于把在中国尚属新兴学术领域的“公共外交”理念加以梳理和分析,将其体系化和理论化,表述却十分平白直述。赵先生基于在涉外领域内的多年实践,通过众多事实、颇具生趣和发人深省的事例对“公共外交”作了详尽解读和论述。读者可以通过该书提示的明确定义、架构和方法论,对“公共外交”加以理解,进而付诸实践。换言之,在中国普及“公共外交”素养因此成为可能和现实。

随着科技的飞跃,复杂和理念化的社会赋予了人们更加多样化的实践使命。比如,手掌大小的手机除通话外还包括各种让人应接不暇的功能。从前的接线员、秘书、打字员等各种职业都由一个人来包揽了。我们正在进入一个被要求承担多重任务和多种角色

的“兼职”时代。

在“外交”这个光鲜亮丽的世界里,也能发现“兼职”的身影。尤其是“公共外交”,这一理念不仅针对专业外交官,其对象同时也涵盖普通民众。而且,人们在日常中的无意识参与往往能带来意想不到的效果。

我同时也期盼读者能心情愉快地品味赵启正先生在书中叙述的一个个小故事,那里蕴含丰富,集合了他在外交领域内多年耕耘之大成。

赵启正先生与我是可以直抒己见、畅所欲言的忘年之交。我每次与赵先生见面时惊叹他学识渊博之余,总会被他绝妙的幽默逗得捧腹大笑。而最让我记忆深刻的是赵先生和美国著名的基督教布道家路易·帕劳合著的《江边对话》中的一段对话:帕劳先生说我们要讨论的问题太多了,将来我们到了天堂还可以继续讨论。不是基督徒的赵先生说,到了天堂我们的样子如果变了怎么相认?帕劳先生回答,到了天堂我们会更聪明,样子变了也肯定能够相认。赵先生回答,还是约定个密码吧,我说“Mississippi”(密西西比河),你回答“Yangtse River”(扬子江)。帕劳先生大笑称道“是好主意”。一位无神论者和一位基督徒就这样跨越了宗教信仰,建立了如此亲密的感情。我想,这个插曲或许最能反映出赵先生的人格魅力。他的身体力行证明了对外交往中应保持的重要姿态:即尊重对方的立场,始终怀着和善敬意。这些生趣的事例,正是赵先生通过该书提示给我们的“公共外交”之心态,也可以称之为结果上的方法论。

(日文版《中国的公共外交》由日本三和出版社出版,本文作者系日本华文笔会会长)

全民外交时代的开启

——评赵启正著《中国的公共外交》

王敏

聊赠一枝春

王本道

自我调到大辽河北岸这座城市工作以来,每年中秋前后都会采些芦花插在办公室的花瓶里。众多的文友看到此种“景观”,争相仿效。一些外地的文友因难于准时来此地采撷,我便利用每年中秋前后的几天多采一些,而后妥善包装托人捎给他们。大连作家素素的书房里,每年都要换上一束新的芦花,有时是她亲自采来,有时是我替她采下。去年中秋,她随中国作家代表团去德国法兰克福参加书市活动,误了采芦花的时间,我适时替她采下,并让同学带往大连。她回国后第一件事情就是径直到我的同学那里取了芦花,并挂来电话说:“真的要谢谢老兄啊,了却了我一年间对芦花的期盼。”其实在全国其他地方,也会有零星芦花的存在,而朋友们所追寻的既是辽东湾湿地上那原汁原味的“玉树临风”,也兼有朋友间清纯热烈的情谊。

与他们一样,每逢节日,我也会收到一则则信息,一张张贺卡,是我的文友、学生、读者寄来的。于是我也会打开手机,笨拙地给他们回发信息,或是去商店里精挑细选些最中意的贺卡,思量斟酌出祝福的语言写上寄发出去。每年在不同的季节里,我还会收到一些看似平常却又十分珍贵的礼物:闽桂山区的相思红豆;西子湖畔的一袋绿茶;京城香山的那股红叶……尽管年逾花甲,眼前已经是满地的落叶黄花,但是看到年轻人那大好的年华洋溢出的巧笑倩

兮,内心总是充满喜悦。嘈杂忙碌的红尘俗事带着许许多多的东西从我的身边悄悄流逝,唯有朋友间真挚纯真的情谊会让我“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诗经》中说:“投我以桃,报之以李。”意思是说人际间的交往是互动的,来而不往非礼也。只是对“礼”是应该操之有“度”的。孔子曾教育自己的学生:“礼,与其奢也,宁俭。”礼下于人,必有所求。怀着极端的功利给上司送厚礼或以礼代贿,并无情感交流可言,而是一种企望回报的感情投资。一些行贿受贿的大案,开始往往都是打着“礼品”的旗号堂而皇之心安理得操作的。孰知,贿赂猛于虎,那些频频曝光动辄数额十几万乃至成百上千万的行贿受贿案,不啻是一次次惊心动魄的恐怖行动,其杀伤力是触目惊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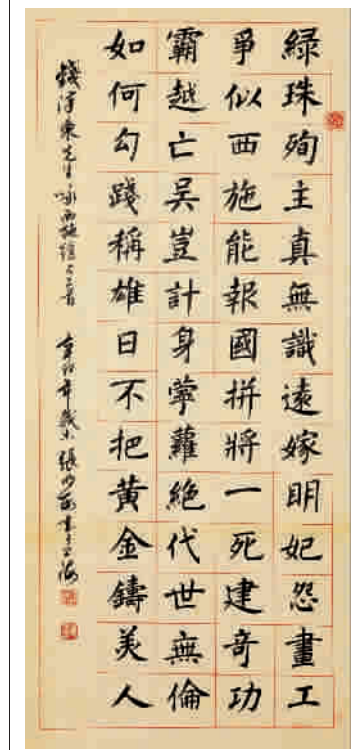
“人生贵相知,何必金与钱。”弘扬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在人际交往中珍视“友情为重”的古朴民风,也是衡量一个人思想道德水准的重要标志。

从莫斯科向南走200公里,便到达图拉的亚斯纳雅·波良纳庄园。这里是托尔斯泰的摇篮和坟墓,托尔斯泰的人生从这里开始,在这里结束。他爱这个庄园,他自己也承认,所以他说:“假如没有亚斯纳雅·波良纳,我也不可能这样热爱我的祖国。”

我们穿越莫斯科南部广阔的原野,在一个秋天的午后抵达那里。我在那里只停留一个小时,他却把一生的财富拿出来献给我们。每年有一百万的来访者,到这里朝拜并领受主人精神的照耀。

这里是一块圣地。

一条土道,两排白桦,引导我们走近那里。树木渐渐多起来。主人喜欢耕作。我仰望那些最高的白桦和橡树,我暗自猜测哪一棵是主人当年种下的。爬上一段缓坡,一幢白色小楼出现了,我的脚步加快。倏忽间迎面走过一位老者,步履有些蹒跚。等他走过去,他的容



书法 张明敏

貌在我眼前重放,大鼻子,深眼睛,穿一身俄罗斯旧式长袍。突然觉得他的容貌有些面熟。

难道是他?难道我与他擦肩而过了?

我再回头找他,他已经消失在长长的林间小道。

我便兴奋地跟同行的人说刚才有一位老者与我们擦肩而过,跟托翁一摸一样。大家都说没注意。我没再细说此事,只把这次奇遇暗自记下了。

也许他想告诉我们什么。比如,他想再说一次:“人不是为了发亮,而是为了纯洁自己。”晚年,他在自己的庄园三省吾身,与自己的财富与贵族身份决裂,对自己的灵魂进行彻底的清洁,。从而完成一个道理主义者的洗礼。现在,他还想对我们再说一次,再说一万次。

海派文脉总有些因时因地的特殊表现。“迪息辰光格上海滩”美术界盛传“淮海路三怪”的故事,我有幸与他们中的几位有所照面,愿意摆一摆关于他们的乌龙事儿。

上世纪70年代最初三四年“疾风暴雨”略有间隙,扼制不了的是民间天才,一帮富于创造力的美术小青年便伺机出动;感谢当时一家“卢湾区服务公司”,囊括了淮海路一带的各行各业,上述美术青年大多隶属于这家公司、或仅仅地缘上接近而得地气。

曾几何时,所有商店的橱窗均不展示商品而成一片“红海洋”,一时形势改观使那么多橱窗空了出来,便成为他们曲线展示其才能的用武之地。他们把橱窗装点一新,外地来沪的画家至今犹记得橱窗里有全中国最棒的水粉画,“可想上海正统美术的水准有多高,”外地画家为之惊叹!现今时尚频道里高喊“创意就是游戏,游戏没有创意”,时尚对接、混搭……”殊不知“创意游戏”曾使当年那帮小青年痛苦万分、几乎搭上了身家性命;他们日夜与灵感相煎熬,每得新创意先被

寻踪『淮海路三怪』

夏葆元

他们自己缝制皮鞋、帽子,翻丝绵袄剪裁春季大衣;他们拆掉棕棚打造新式家具;有自己自制照相机,用一根牛皮筋牵着一个发夹,居然收放自如地充当快门;用旧报纸加浆糊,按“包豪斯”样本,一层层糊出把新型的座椅;或以一个煎油条的生铁锅配以海绵人造草的边角料,做成当年超现实主义的单人沙发。

他们在绘画上也各有建树,只是把印象野兽叠叠抽象各派作自由混搭,统称“新派画”,自觉在

叶圣陶是吴(苏州)人,谈吐自然是乡音。但他希望写出的文章句句都是普通话的味儿,因此想请人把关,最后找到了生于北国的张中行。其时,叶老主持教育出版工作,张中行在其麾下任编辑。

文章发表后,叶老派秘书送稿酬给张中行。张中行不敢收。叶老又派人送去,并附信曰:劳动得酬是天经地义,张中行仍不敢收。第三次,叶老附信曰:若再不收,便是不愿帮我忙,以后只好不收了。张中行见叶老如此认真起来,不收不行,但提出只收稿酬十分之一。叶老再附信,说应该是七分之二。

张中行感动地说,在他熟悉的前辈中,叶老的“德”应该排在最前列。

可是我们不一定能听见他的忠告。我小心地走进那幢小楼。与彼得堡、莫斯科那些大而无当的建筑相比,他的住宅实在矮小、狭窄,甚至承不下主人伟大的身躯。再看看主人的书房和书桌吧,朴素、局促,很像藏在角落里的一个储藏间,绝对容不下《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可是主人就在这个矮小、狭窄的地方完成了伟大的思考和写作。

在那里,崇拜者们也把主人的声音录下来,所以现在人们仍日能听见他对世界的疑问。现在听起来,既是主人的疑问也是主人的提醒。比如他的声音通过录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也是那么多。虚荣!墓门前都是虚荣!这是我们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代谈着爱、光荣与痛苦,我们这世纪只是虚荣和时尚呢?”

薛涛



明月二三事

陈丹燕

在哥斯达黎加的云林自然保护区,看到指甲盖大小的鲜红毒蛙,精致如同雕刻出来的小蛙曾经是土人抵抗西班牙人枪炮的利器,一个小蛙的毒汁可以杀死二千人,那是如此精彩的造物。和在北极时一样,小红蛙让我想到的是创世纪里的话,上帝在第六天看着创造出来的世界,一切都好,便歇息了。雨林何其完美。

密林中,到处都能看到棕榈科的树木,那些都是人类出现前就已经生长在这里的古老树种和藤蔓,阔叶背面有白色或者粉红色的霉菌,它们也是人类出现以前就已经沉睡了的古老生物。气候变暖时,它们也会开始复活过来。走在那密林中,觉得好像世界彼此相连,只有我这个人类,是新来的闯入者,一个多余的。不会像树那样生长,不会像霉菌那样沉睡,不会像毒蛙那样唱歌,并长出如此鲜艳的红色,不会像鸟一样飞翔,甚至不会像大象那样默默地死去。

美术史的领先地位。据统计,他们不屑于也没有一个敢于把作品送去上海美术馆参加评选,而定期送到位于绍兴路,因而得名“绍兴沙龙”的客厅里,一边猛抽8分一包的劣质香烟一边相互点评。他们用竹片自制刮刀,用水粉画面上油冒充油画,那种肤浅幼稚的尝试并不可

笑,活现一个时代的闭塞。不知从何处他们听说一个叫“篷纳”(波那儿)的法国画家,认为这个名字够爽快,相互见面时便篷纳篷纳叫个不停,几成一道帮派口令;还有“莫德格利亚尼”(意大利画家),他们流畅地随时叫唤……虽然他们当中无人见过这两位外国画家的作品。

不久风声紧逼,上边正在追查“淮海路三怪”的劣迹,谁也不想受到牵连。某日门房通知我有位怪人求见,我老远望去一

叶圣陶是吴(苏州)人,谈吐自然是乡音。但他希望写出的文章句句都是普通话的味儿,因此想请人把关,最后找到了生于北国的张中行。其时,叶老主持教育出版工作,张中行在其麾下任编辑。

文章发表后,叶老派秘书送稿酬给张中行。张中行不敢收。叶老又派人送去,并附信曰:劳动得酬是天经地义,张中行仍不敢收。第三次,叶老附信曰:若再不收,便是不愿帮我忙,以后只好不收了。张中行见叶老如此认真起来,不收不行,但提出只收稿酬十分之一。叶老再附信,说应该是七分之二。

张中行感动地说,在他熟悉的前辈中,叶老的“德”应该排在最前列。

可是我们不一定能听见他的忠告。我小心地走进那幢小楼。与彼得堡、莫斯科那些大而无当的建筑相比,他的住宅实在矮小、狭窄,甚至承不下主人伟大的身躯。再看看主人的书房和书桌吧,朴素、局促,很像藏在角落里的一个储藏间,绝对容不下《战争与和平》和《安娜卡列尼娜》。可是主人就在这个矮小、狭窄的地方完成了伟大的思考和写作。

在那里,崇拜者们也把主人的声音录下来,所以现在人们仍日能听见他对世界的疑问。现在听起来,既是主人的疑问也是主人的提醒。比如他的声音通过录音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人是那么多,故虚荣也是那么多。虚荣!墓门前都是虚荣!这是我们世纪的特殊病,为何荷马与莎士比亚时代谈着爱、光荣与痛苦,我们这世纪只是虚荣和时尚呢?”

薛涛



王辰安康 蔡剑明

个身着墨绿色自制绸裤的站在大门口,两腿焦虑地替换站立重心。我示意门房避而不见。忽一日深夜有人轻拍房门,开门只见楼梯自下而上一字排开、个个眼睛在黑暗中放光——“淮海路三怪”的全班人马竟悉数前来投案了,原来他们并非三人而是一帮!他们纷纷表述“淮海路三怪”另有其人他们不属此列,急于撇清自己与这不光彩名称的关系,他们错以为我能耐替他们往上边说句好话。当时(1974年4月)我正为一套称作《恋爱史》的“黑画”受到勘察朝不保夕。

“江山代有人才出”,38年前排列在楼梯口殷切而矜持的小青年正是一群生不逢时的“现当代艺术家”兼“时尚达人”,为自己的“另类”付出代价的时刻终于到了!此时他们选择平庸宁可放弃天才,四处求告又求告无门,但求避过一场政治风险。那晚,我因自私自保而任由他们失望地离去。

十日谈

域外名人故居

明日请读一篇《卢米埃尔兄弟之家》

